



開始的荒蕪 (2010)

/陳大為

剛到台北大學教書的時候，面積龐大到可以用遼闊來形容的三峽校區，只有一棟剛落成一年的人文學院大樓，周遭呢，全是荒蕪的空地，白天人煙稀少，入夜後恐怕連一隻遊蕩的鬼都找不到。鬼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風。

我的第一任助理大甜非常生動的描繪了某位老師被風推倒在地的景象，共兩次，聽起來驚心，還有點痛。這風有土匪性格，不管迎面或從背面吹來，那股狠勁常令人難以招架，只能任憑它往身上粗暴地搜索，掠奪，即便一無所獲，也要給落難者留下一頭狼狽的髮。人文學院一樓的川堂，儼然淪為匪風作歹的首選刑場，有好幾次把我往後推了幾步，或把髮型吹成瘋子。在那個當下，實在很想把這風韁起來，抽上幾鞭，好好馴化一番。

被荒蕪包圍的人文學院，意外獲得異常遼闊的視野，出入的人影顯得格外孤單，有幾次走在黃昏的校園裡，我竟然產生現代水墨的幻覺。詩化一點的說法應該叫：萬徑人踪滅。我很難精準地指出二〇〇二年的文院究竟有多少師生入駐，在這棟走起路來總是產生回音的十二層大樓裡，要點算人頭是件挺吃力的事。感覺上如同一座遺世而獨立的小小山寨，人口三五百，樹口同樣三五百，停車格比車子多，研究室比老師多，平日有一種薄薄的熱鬧，假日剩下零分貝的空城一座。

最初的那兩三年，中文系老師必須到民生校區教大一國文課，系上其他老師都住台北，惟我住中壢，早上九點的國文課對我來說簡直生不如死。打從早上七點半開始，我就得加入國道一號的恐怖車陣，萬一（其實是經常）碰到要命的車禍和更要命的觀禮車潮，短短四十公里就得走上兩小時，一路上不斷釀造殺氣，以及沒有聽眾的咒語。蝸行到校，什麼樣的精氣神都耗掉光了。寸土寸金的民生校區是我最討厭的地方，那棟看起來跟高中校宿差不多的教學大樓，完全沒有半點大學的氛圍，要不是大一學生特別有活力，在這裡教書絕對會磨損教學的熱度。

我比較喜歡三峽校區，從荒蕪的過去，到大樓林立的現在，都喜歡。

我的研究室在七樓，從一大片半落地的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國道二號，以及嬰年階段的北大特區。窗外的荒蕪感理直氣壯地滲透進來，一整面牆的書櫃騰出全部席次來迎接它。這書櫃也未免太大了些，至少可以塞進兩千本書，沒書的櫃子除了空洞，自然產生灰色的暗示：真正的主人尚未入駐，或者隨時準備離開。我習慣在家裡工作，沒幾本閒書可以搬運過來，只能象徵性陳列了三本厚厚的三民大辭典，裝點門面。在每個串門子的學生眼裡，合情合理的把我看成騎驢找馬的過客。

第一個企圖瓦解過客感的物件，是大甜精心設計的「陳大為怒沉百寶箱」，眼尖的人都好奇，從那木匣子擺蕩回來的眼神，彷彿在等我或等他解說寶匣的秘密。大甜畢業後，寶匣及其典故依舊安坐原處，儼然成為七二六研究室的鎮室之寶。助理是我跟中文系的最重要訊息渠道，我特別喜歡口不擇言的傢伙，不是為了聽八卦，而是更能夠知道其他學生心裡的想法。尤其在那個還不流行教學評鑑的年代，很多聲音必須主動去蒐集，不然一門課壞教了也找不出原因。

大甜卸任後，七二六便交給嵐伊和阿心來打理，原本荒涼且冰冷的空間，慢慢溫暖了起來，他們使用研究室的時間比我長，人氣因而凝聚。可能是節能之故，研究室外的整條走廊偏暗又偏冷，每次我進來都把門打開，讓陽光和燈光聯手普照走廊最陰冷的轉角，還點了微量的檀香，交給氣流帶出去溜躑。兩三年下來，透骨的寒冷就不見了。有時晚上阿心會帶他的貓咪來陪寫作業，嵐伊則不時添置一些充滿趣味性的小東西，七二六開始有了一點讓人想逗的溫馨。

那時中文系還很年輕，沒有包袱，只有草創時期的自由。

我曾經是系上唯一的現代文學師資，高興開什麼課就開什麼課，更重要的是授課時間，由老師自行安排，只要兼顧到各年級學生的選課權益，都可以排上去。運作久了，它慢慢成為一個很人性化的制度，規律中保有極大的彈性，而且本系老師們從不搶課，各種專長都得到妥善的安排，所以這個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剛開始教現代文學的頭一兩年，我獨撐三門課（外加三班國文），實在有點吃力，後來有了范銘如的加入，才比較輕鬆。我們開出更多樣化的現代文學課，並創辦了飛鳶文學獎，培訓了幾位頗有天份的寫手，幾乎把所有文類的獎項都留在中文系和前來選修的外系同學手裡（兩年後她轉到政大台文所，磨練研究生去了。這是我們難以彌補的損失）。我的左右護法嵐伊和阿心，非常爭氣的拿下四座首獎和好幾座評審獎，兩位台北大學的得獎王，讓我大大沾了光，七二六遂成了地靈人傑的代名詞。他們畢業後，這項光輝傳統就交捧給凱特（同樣才華洋溢的凱特，後來尾隨阿心到東華去了）。

從凱特細數下來，還有老是心事重重的睿杰、專門對付電腦軟體的怡聖、長得十分帥氣的佩雅（和如影隨形的死黨育禪）、讓我的教學如虎添翼的貽婷、被誘拐到馬華研究的馨函，這一長串的名字和臉孔，先後在七二六出現，消失，然後不定時在電郵和簡訊中蹦出來，或者回來探探親。前些日子，已經畢業的佩雅，很意外的帶著好吃的便當出現，專程回來陪我吃午餐。她前前後後幫我買過上百個便當，我吃什麼不吃什麼她都清楚。在輕鬆的閒聊中吃完午餐，再陪我走一段路到商學院上課，那是她常做的事。她還是那麼開朗和帥氣。除了馨函，大家都走了。有的在申請歐美的博士班，有的準備嫁人，有的被指導教授遺棄在學位論文的泥淖中。總之呢，他們的近況或故事，仍然會從四面八方慢慢的匯流回來，再蒸發，成為朦朧的印象。

越來越覺得，我才是真正留守在七二六的人，而且是唯一的。久違的荒蕪，原來一直埋伏在角落。

可是呢，一旦踏進教室，立即產生人滿為患的巨大反差。不管是中文系，或統計與會計系的國文課學生，都是活潑份子，尤其一百多人的國文課，必須使上十成功力才鎮得住。三堂課教下來，隱隱會有虛脫感。

在設立研究所之前，我偶爾會在某一兩門課提高教學難度，把大學生當半個研究生來教，

看看能否磨出個天才。這習慣不知不覺的沿襲下來，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教學上特別管用。這門隔年輪開的選修課，每次開設時，我必得大幅降低自己在學術研究和創作的比例，投入最大的心力。我常跟學生說：這是中文系的最初也是最後，是入門的初階也是一生學問最終極的累積，如果哪天我們能夠提出一套完全屬於自己的對文學史的看法，學問才真正做到家了。這群懵懵懂懂登上賊船的小伙子，必須研讀指定的原典，必須學習跟課本維持一個思辨的距離，在一個穩定的基礎上去思考文學史典律的形成問題。很意外的，他們居然都能辦到。在我最近一次開課的學年，學生在討論區上發表了一百多篇文章，三五千字的大長篇十分常見，有很多見解遠遠超出我當年的水平之上。青出於藍的感覺，真好。

每年總有十幾位外系學生來選修我的課，不時會碰到一兩位筋骨奇佳的練武奇才。中文系才是你們的歸屬啊，我忍不住對他們這麼說。其中的天字第一號允元，後來棄法投文，改念台文所去了，最後還跟我們中文系土產的地字第一號伯軒，在政大博士班當鄰居（那可是范老師的勢力範疇啊，發條要上緊）。

在台北大學教書很有樂趣，一方面是學生程度好，悟性高，閱讀意願和互動性強；另一方面是硬體設備完善，尤其在數位化教學方面，可以達到最理想的效果。可惜我們的圖書館資源不及其他老牌大學（耗資數億的新館目前才蓋到一樓），加上我們只有一個全國最小的中文碩士班，每年只招收四點五個研究生，無法留下優秀的本系畢業生。（我很想跟新上任的校長說：把其餘招生情況欠佳的研究生名額轉移給我們吧，別浪費在過度膨脹的系所上面。）

說到研究所，得回到七樓。

跟七二六間隔著一條走廊的是研究生教室，我以前常弄不清楚它究竟是七二幾。反正七樓屬於中文系碩士生上課的地方只有兩處，七二五是我第二熟悉的研究室。我教的第一班碩士生只有四人，除了貽婷和馨函，還有若昕和文婷。這個班，小歸小，但提問和討論的氣氛出奇的好，提問的從不擔心功力深淺，討論的大膽亮出自己的獨門刀劍。七二五的教學，永遠是歡樂的。我相信其他老師的課也一樣。後來我們辦了一場研討會，把她們全帶到初春的東京去發表演文，連同第一屆碩士班的宜蓉、淑婷、韻玲都去了，當作兩屆碩士生的聯合畢旅。二〇一〇的東京，是難忘的。

我們的中文系很小，碩士班更是迷你，但老師跟學生的互動相當緊密，雖然我們沒有國學大師，缺乏偉大的故事或不朽的傳統，但我們盡了最大的能力去開設每一門課，每一部碩士論文都在充份的指導和討論中誕生。況且我們有很聰明、用功，活力十足的學生，以及在常常加班到晚上的宜蓉助教，所以我們能夠推動五個系列研討會，兩個系列演講，以及五花八門的活動。

我在這裡教得開心，過得寫意，儘管七二六的陳設看來好像隨時準備打包走人（前兩天在此受訪時，才赫然發現桌曆居然是去年的版本），但我從來沒有跳槽的念頭，甚至有終老於此的打算。

昨天我從電腦裡翻出早年的校景照片，然後到三峽校區各棟大樓間取景。這次沒遇上土匪性格的風，只有紳士，看來是校內的幾棟魁梧的學院大樓，跟北大特區龐大的公寓樓群裡應外

合，狠狠馴化了它們。加入剿匪大計的，還有樹。十年來總務處環境組竟然種了上萬棵樹，現在還很年輕，等我退休的時候應該長成森林，會有數百株櫻花盛開的迷人光景。很難想像，這一切竟然從荒蕪開始，才十年。

才十年，我已經不用費盡唇舌去解釋台北大學跟中興大學的淵源，也不必特別強調它在北二高樹林收費站旁邊。去年秋天，我跟貽婷為了挑選亞太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的晚宴餐廳，把整個北大特區逛了一遍，結結實實感受到它的崛起，無論是北大校區或北大特區，都不再是我當年從七二六遠眺的舊風景。荒蕪，已經是很久遠的事了，我有幸目睹到荒蕪的開始。

按：這篇文章十年前應《聯合副刊·大學巡禮專輯》而寫，有點為台北大學和中文系宣傳的味道，再讀舊作，有些感覺不同了，這些時間的印記還是值得保留下來。